

日治時期台灣的「通譯」

許雪姬

摘 要

通譯又叫通辯，有時也稱做翻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因為日、台語（或稱土語）不同，需要大量的通譯人材，台灣總督府一方面設立國語傳習所以培育受過漢文教育的台人學日語，以便擔任兩者之間溝通的橋樑，另方面也開班教授日本下級官僚學土語，依成績加給，或訓練專人為通譯。迨各地公學校陸續建立後，通譯人才之需大量減少了，總督府等公家機關所需的通譯、翻譯其員數即定著化，以 1924 年（大正 13 年）為例，總計為 62 名。

本文以日治時期台、日人任通譯者為例加以探討，在職場中，除官廳的通譯外，私人的通譯也不少，尤其是大戶人家；而通譯雖是專職，但大半短時期充當，且利用任通譯時的人脈更換更好的職業。通譯的待遇雖然不差，但大半還要兼秘書、隨從、導遊等職，事實上是一種工具性的存在，其社會地位亦不高。1937 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征調台人為軍夫、軍屬，通譯屬於軍屬的一種，被抽調上戰場從事第一線的溝通工作，但通譯本業外，還要當斥候、充當宣撫、問案的工作，且面臨心理極大的衝擊，甚至有殉職者。

過去這一行業在日治台灣社會上的角色及地位尚未有人從事研究，故本文舉出五個較為代表性的例子，以供參考。

一、前言

語言是人與人間表達、溝通意會最重要的工具，言語不通的雙方必須通過「通譯」始能溝通，以便減少誤會，避免衝突，因此通譯的角色相當重要。舉例來說，日治初期來台的通譯只會北京話，而台灣本地是以閩南語（稱福建語或台灣語）為主，因此要在台北買牛肉，居然要頭綁兩隻柴魚做牛角，趴在地上做出牛狀，以便店家了解要買的是牛肉。¹又比如初通台語的日人要搭輕便鐵道到台中，他怕所坐的台車翻車，乃食指彎曲，指坡度陡，對車夫說：「汝要慢慢」，再把手指伸直，指平地說：「汝要緊緊」，車夫似會意，說「好好！」，不料自三叉河到葫蘆墩（即豐原）間有坡度極陡處，車夫卻飛快地前進，終於翻車。日人指責車夫，沒想到車夫仍答「好好！」，實則車夫聽不懂日人所說的台語。²

所謂通譯（つうやく）一詞系日文，口譯者之意，又稱通辯（通辯，つうべん）。這種溝通的角色，在台灣早期歷史中也有，只是既未形成一種「職業」，而是兼業，也未形成一固定的稱呼，迄今台語的詞彙中沒有相關語詞。據載，西班牙統治北部Ketagalan各社時，主要的通譯是金包里人，³清代也設有懂得漢語、番語的通事做為溝通的橋樑，乾隆以前通事大部份是漢人，乾隆中後期就都用原住民。⁴此外清廷來台官員應該也有通譯，否則難以問案，因為清廷任官有迴避本籍 500 里的規定，但相關史料均未記載這類的角色。

日本領台之初即了解語言對於未來統治的重要性，因此要日人官吏學土語（包括福建語、廣東語、蕃語），也要台人學「國語」（日語），因此設有國語傳

習所，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不過無論總督府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使全部台人學會日語，全部日人學會土語，通譯乃應運而生，成為一種正式的職業與編制，但不少人只是以通譯做為晉身之階，而未成為終身的職業。⁵

通譯不僅有台人也有日人，初始在官廳透過考試而任用，和戰爭中進入軍隊的通譯不同，後者的危險性極高。這一個新的職業過去從未有人研究過，故值得深入探討。

有關通譯（包括翻譯官）的資料不少，〈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就有 1,042 筆，大半是日軍來台初期的相關資料，總督府出版的《官報》、《府報》以及《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就可看到相關的法令規章及通譯實際任職的分佈，《人士鑑》等相關人物傳記也讓我們了解通譯的生平；由《事變と台灣人》一書可了解戰地通譯的辛苦及皇民化運動後這些戰地通譯的樣相；口述歷史相關資料得以了解更多通譯的實例，《亞細亞的孤兒》這部小說所描寫的堂弟胡志達及胡太明這兩個角色都擔任過通譯，大致可以理解通譯內心的煎熬及通譯給一般人的觀感，而幾個著名的通譯以及由通譯出身而立足於官場者，或許也能增添讀者對通譯的了解。

近年來針對不同的行業當時人的形像，以及職業本身，陸續有人從事研究，如任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社會學家駱明正，其大著“*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⁶陳君愷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也有人研究律師的角色，⁷因此由職業的角度切入亦不失為一個研究的方向。

本文擬由通譯的養成談起，其次探討官方對翻譯官及通譯的編制來看那些特別的機關最需要通譯；早期的私人通譯大半服務資產家、會社及律師，他們的情況如何？隨著日本統治時間的加長，台人懂日語的愈多，因此就不再需要大量的通譯，政府的編制也逐漸減少，但是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也加速對中國的侵略後，軍中所須的通譯日多，這時的通譯和前期的有何不同？最後如謝介石由通譯出身到「滿洲國」第一任外交部總長；許文葵任台中州通譯帶領佐藤春夫遊中部台灣所留下有趣的紀錄，另外如片岡巖、東方孝義留下豐富的著作，為研究台灣史者所不可不看，筆者親自訪談任菊機關憲兵隊長通譯洪口明的現身說法，都會有助於了解日治時期「通譯」的角色。

二、通譯的養成與甄訓

（一）官方設置學校培養通譯⁸

芝山巖學堂時期，台灣總督府任命部員 8 名，先研究土語，編輯相關土語之單語篇、會話篇，⁹繼則招募士林附近台人子弟做為試教日語的對象，做為未來推廣日語的參考；而後招募日本語傳習生 21 名加以訓練；但翌年（1896 年）1 月 1 日發生芝山巖事件，傳習日語的工作乃告一段落。¹⁰3 月 3 日台灣總督府設國語傳習所，分成甲科與乙科，甲科以訓練通譯為目標，招收已具備普通知識的青年加以訓練，以語言訓練與養成國民精神為主要的目標，半年即可畢業。1897

年通譯的迫切需求已告減緩，因此以培養通譯的甲科在 1898 年（明治 31 年）公學校令發布後，被編入公學校速成科，而後遂廢。¹¹

除了國語傳習所外，4 月 1 日也設立了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分為師範部與語學部，前者旨在培養初等教育教師，而語學部則分成土語科與國語科，土語科是讓日人學土語，國語科是教台灣人日語。語學部修業期限三年，比師範部多一年，土語學科招集日本國內 15~25 歲之間有高等小學校畢業學力者；國語學科則招國語學校附屬學校（供國語學校學生實習而設的學校）或畢業於國語傳習所以上學力者，¹²土語科三學年每週有 12 節課，教音韻的性質、言語的種類、會話實習、語文讀法、作文等，土語科在 1902 年（明治 35 年）廢止。¹³

國語傳習所一共造就多少學生，依許佩賢自〈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台灣新報》做成的名單如下：

傳習所	第一屆(1897. 4)	第二屆(1898. 4)
台北	21	16
基隆	19	12
新竹	41	45
宜蘭	29	23
台中	0	31
彰化	20	0
苗栗	33	26
雲林	15	0
台南	27	0
嘉義	26	0
鳳山	4	0
恒春豬勝東分所	9	0
澎湖島	30	0
	284	153

這其中以新竹傳習所共培養 86 人為最多，又以謝介石最為有名。該所二年內共培養了 427 人，但因未區分出甲、乙科，如果以一半來計，也有 200 多個通譯。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土語科畢業者與土語專修科畢業者人數約計如下：

土語科	1900 年 3 月(明治 33 年)	22 名
	1900 年 4 月	2 名
	7 月	5 名
	1901 年 7 月	12 名
	1902 年 5 月	1 名
	6 月	8 名

土語專修科	7 月	12 名
	1900 年 7 月	3 名 ¹⁴
		共 65 名
語學部國語科到 1902 年（明治 35 年）改為國語部，之前培養的通譯人才有：		
	1900 年（明治 33 年）3 月	20 名
	1901 年（明治 34 年）3 月	22 名
	1902 年（明治 35 年）3 月	13 名
	1902 年（明治 35 年）7 月	11 名
	1902 年（明治 35 年）10 月	1 名
		共 67 名 ¹⁵

亦即到 1902 年至少已培養了 330 多名通譯人材，何況師範部的畢業生也有可能當通譯，因此培養通譯的急迫性已趨緩和。

（二）自學土語參加通譯考試

另外，除了上述官方機構外，民間也有私設國語傳習所的設施；如 1896 年（明治 29 年）隨日軍來台的佛教派系如真宗本派本願寺、曹洞宗、真宗大谷派等僧人先後來台，在台北、台南創設私立日本語學校，不僅未收學費，且每月底還以筆、墨、紙做為獎品，鼓勵學生。這些把握第一時間學得新語言者，往往能在各廳擔任基層吏員的通譯，為商者學日語，亦能大發利市，因此學者踴躍。¹⁶一些日本有識之士也提倡來台就應學土語。日人湯城君茲（博文堂出版社社長）即出版《日台會話新編》，不久就發行增補三版，書前由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題字，¹⁷1899 年（明治 32 年）底發行《台灣土語叢誌》第 1 號，到 1901 年（明治 34 年）底為止共發行 9 號，內容有論說、會話、會話俱樂部、叢談、笑林、問答、一口ばなし（短笑話）等欄；還有些有關台灣民俗的插圖，間刊有台灣語研究會的文章、動態。兼松道江開有教台語的義塾，也出版可以自學的《台灣語發音學》，初版為非賣品，立刻就再發行第二版，¹⁸可見初始來台日人，在政府和書商鼓勵下有不少人學台語，但因台灣語學因而中斷不學者也不少。¹⁹

以下舉出警察官要兼土語通譯者的考試題目，第一題是有關問案，第二題是鴉片有關的題目。試題用漢文寫，應考者要拼土語讀法，再譯成日文，而題目是十六句一問一答，如我看恁主人的批、事情的意思差不多明白、也有小的無明白的情形、打算問你敢會知是、批內敢有攏寫詳細了。²⁰

台灣歸阮日本帝國以後、衙門有設規矩、若無吃的攏不准伊知、所以免若久此號歹風俗就無了了、我想百姓有歡喜按怎樣啊。

較失禮、實在不是如此、彼號有的一一定著食以外、照慣習與人交陪、大概攏有吃淡薄、相似日本人吃酒相同欸（款）。²¹
另有日本為調查台灣土地所設的土地調查局，採用通譯時的考題，共有六問，相當難，如第二問：

伊講這邊所在本是平埔蕃的、漢人來此以來、伊漢人對平埔蕃給墾。

第三問：

本成、納錢糧是大租戶的事情、光緒十四年清丈的時候、劉撫台出告示換這個法度、大租減四成歸小租戶納錢糧。²²

隨著台人很快學得日語或借助通譯即可和台人溝通，何況又是殖民者，因此學會台語的民間人士不多；而特殊行業如巡查、看守，習得台語在薪水上有津貼，²³因此常有本職加通譯，即兼任通譯；或因學會土語，因而不必另聘通譯。

（三）、官廳中的通譯編制

以 1904 年（明治 37 年）總督府所出最早、較完整的職員錄《台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為例，來看該年度各機關所用的通譯：

1. 法院、各廳所用的通譯最多：20 廳時代，法院是二審制，設有覆審法院及覆審法院檢察局，各地地方法院和一些出張所（辦事處）。

（1）覆審法院：6 個通譯，3 個專任 3 個兼任，專任者為谷信敬、陳文溪、山中幸吉，兼任的有鉅鹿赫太郎、有馬貞吉、施錫文。²⁴

（2）覆審法院檢察局：4 個通譯，1 個專任 3 個兼任，專任者為施錫文，兼任者為陳文溪、有馬貞吉、西川義祐。²⁵

（3）台北地方法院（包括新竹、宜蘭、台中出張所）：6 個通譯，4 個專任 2 個兼任，專任者為有馬貞吉、鄭蘭汀、水谷利章、安藤元節，兼任者為陳文溪、水谷利章。²⁶

I. 新竹出張所：4 個通譯，3 個專任 1 個兼任，專任者為有馬傳藏、陳阿來、石川新太郎，兼任者為楊廣堯。²⁷

II. 宜蘭出張所：2 個通譯，專、兼各 1 個，專任為韓勳夫、兼任者為中間小二郎。²⁸

III. 台中出張所：4 個通譯，3 個專任 1 個兼任，專任者為橫田次節、林覺太、王錦堂，兼任者為氏原靜修。²⁹

（4）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局（包括新竹、宜蘭檢察局出張所）：共有 6 位通譯，專任 3 個兼任 3 個，專任為今田祝藏、天羽次忠、西川義祐，兼任者為陳文溪、有馬貞吉、施錫文。³⁰

I. 新竹出張所檢察局：4 個通譯，專兼各 2，專任者為楊廣堯、石川新太郎，兼任者為有馬傳藏、陳阿來。³¹

II. 宜蘭出張所檢察局：兼任通譯 1 名，中間小二郎。³²

（5）台中地方法院：四名兼任通譯為橫田次郎、林覺太、氏原靜修、王錦堂。³³

（6）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包括嘉義出張所）：6 名通譯，5 名專任 1 名兼任，專任者為榊原源太郎、川合真永、澤谷仙太郎、原一鶴、趙鍾麒，兼任者王式瑤。³⁴

I. 嘉義出張所：3 個通譯，2 個專任 1 個兼任，專任者為岩崎敬太郎、林久三、兼任者為賴雨若。³⁵

（7）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包括嘉義出張所檢察局）：4 名通譯，專任 3 名兼任 1 名，專任者為趙鍾麒、王式瑤、仁禮龍吉，兼任者為榊原源太郎。³⁶

2. 總督府相關單位：

- (1) 鐵道部總務課、汽車課：海老原雄吉，總務課為兼。
- (2) 專賣局庶務課：三村久槌。
- (3) 台北監獄新竹支監第三課：宮本健太郎，兼監吏。
- (4)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共有 5 個通譯，其姓名及年薪如下：大木熊雄（年 840）、野村潔己（年 840）、安西久（年 580）、大山茂一郎（年 540）、山西作松（年 480）。³⁷

3. 各廳中大半為警務課、總務課、稅務課用通譯

- (1) 台北廳：總務課郭邦彥、警務課高崎小一郎。³⁸
- (2) 基隆廳：總務課田中德吉（兼）、警務課福井友次郎。³⁹
- (3) 宜蘭廳：總務課林澤蔡、警務課長陳純精。⁴⁰
- (4) 深坑廳：總務課楊庚生、警務課太田虎太郎。⁴¹
- (5) 桃園廳：總務課葉心榮、警務課太田虎太郎。⁴²
- (6) 新竹廳：總務課李雲盛、警務課藤本真茂，稅務課李雲盛。⁴³
- (7) 苗栗廳：警務課大野勝衛，同時任職大湖支廳。⁴⁴
- (8) 彰化廳：總務課濱田寅吉（兼）。⁴⁵
- (9) 南投廳：總務課曆則有，警務課兼任。⁴⁶
- (10) 斗六廳：總務課黃服五、警務課葉朝紅。⁴⁷
- (11) 嘉義廳：總務課蘇孝德、警務課郭鳳。⁴⁸
- (12) 鹽水港：總務課山名正真，警務課山名正真、栗原萬三郎（兼）。⁴⁹
- (13) 蕃薯寮：總務課舛尾京、警務課林田軍五郎。⁵⁰
- (14) 恆春廳：總務課陳木榮。⁵¹
- (15) 台東廳：總務課谷山愛太郎、森賢輔。⁵²
- (16) 澎湖廳：總務課折田廬彥（兼）。⁵³

在這些通譯之上還有二名奏任官，即翻譯官，亦做通譯等工作，1904 年在總督府文書課有三好重彥（圖書掾主任）總督務局勤務、谷信敬（法院通譯）；⁵⁴外事課的翻譯官亦為三好重彥。但他們未必是土語翻譯，有的是北京話或洋文翻譯。

由上述各名單可以得出幾項結論：一、覆審法院、地方法院、覆審法院檢察局、地方法院檢察局等機構，地方單位的通譯大概都互相兼任，其中還有兼任非通譯職務的如兼書記的水谷利章、天羽次忠；至於廳中則以兼警部者為多，也有總務課、警務課互兼的；總督府相關部門，則有監獄通譯兼監吏。二、任職法院、總督府相關機關的通譯以日人為多，但各廳的則以台灣人為多；三、就日人所附籍貫而言，大阪、京都、東京等大都市來的日本人很少，以來自鹿兒島、福岡、熊本、新潟、岡山、佐賀、長崎、愛媛、長野、山口為多。四、台人中有些人畢業自國語傳習所，如新竹國語傳習所第一屆的鄭蘭汀，第二屆的李雲盛、葉心榮；宜蘭傳習所第一屆的陳純精、林澤蔡；嘉義國語傳習所第一屆的黃服五、蘇孝德，⁵⁵卻未見有國語學校語學部國語科學生。

到 1920 年（大正 9 年）台灣地方行政改變前，台灣各法院、檢察局書記的

定員計：高等法院 3 人，高等檢察局 1 人，台北地方法院 8 人，台北檢察局 5 人，台中地方法院 3 人，台中檢察局 2 人，台南檢察局 4 人，台南地方法院 7 人，⁵⁶專賣局庶務課通譯 1 人，⁵⁷各廳則有 16 個通譯。⁵⁸

不過如果觀察 1924 年（大正 13 年）《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總督府翻譯官一名，由三等一級的小川尚義擔任，年薪 3,800 圓；調查課設兩名兼職的翻譯官，通譯兼一名；外事課翻譯官課長一名，由四等三級的法水了禪擔任，設有通譯一，社寺課翻譯官由課長編修官丸井圭治郎兼；⁵⁹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則設有通譯 2 名，法院通譯川合真永及蕭祥安。⁶⁰法院則有專任通譯 35 人，⁶¹專賣局有專任通譯 3 人，⁶²監獄有專任通譯 4 人，⁶³各州廳判任通譯 20 人（台北 4，新竹 3，台中 4，台南 4，高雄 4，花蓮港廳 1。）⁶⁴台灣總督府不算，法院、專賣局、監獄、各州則共有 62 個通譯。

除了總督府所屬單位外，也有任陸軍、憲兵通譯者，這些通譯一來難以判明是北京話的通譯還是土語通譯，二來也以日人為多。以陸軍通譯來說，日人有大宮記國、高橋安規、持木壯造、松本龜太郎、室田有、山瀨肇、村田義教、關善次郎。⁶⁵台人則有以下四位：

1. 曾遠堂：1873 年生，台南人，1896 年任陸軍通譯，並未見入台南國語傳習所就讀。⁶⁶

2. 陳清澤：1876 年生，台南人，台南曹洞宗國語學校畢業，1905 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⁶⁷

3. 顏雲年：1874 年生，台北人，父親那一輩已入碳礦這行業，年輕時曾為勞働者，日本領台當初成為陸軍通譯，而後又任辨務署通譯。⁶⁸

4. 饒永昌：1880 年生，新竹人，1898 年任新竹廳陸軍補給廠通譯，而後東渡花蓮，1906 年任花蓮賀田組通譯。⁶⁹

台人中亦有任憲兵通譯者，如台南的辛西淮等。

1. 辛西淮：1879 年生，1897 年 4 月起擔任憲兵隊通譯，據其子辛文炳說，他只學了幾個月的日語即擔任這個工作。學日語之處為日本真宗本派本願寺佈教使在台南所設的「開導學校」，起自 1896 年 6 月 1 日迄 1907 年閉校。他擔任通譯的時間約 1 年 5 個月。⁷⁰

2. 王式璋：桃園大溪人，清代曾出仕撫墾總局，前後七年。日治後為憲兵屯署幫辦通譯，前後三年。⁷¹

3. 林土城：今高雄楠梓人，累世營商，1897 年被任命為憲兵屯所通譯。⁷²

上述三人都未受過日本的正規教育，除辛西淮有明白的日語教育途徑外，料想都受過短期的日語訓練，而後擔任通譯的角色。

三、私人的通譯

私人的通譯不少，包括為不懂日語的台灣士紳所雇用者，以及律師的通譯等，且以這兩類為多。年長，或不願學日語的台灣士紳在與官方間連繫時要靠通譯，當然私人的通譯應該還兼導覽、秘書、隨從等重疊的角色，對台灣士紳而言，

通譯不是萬能，但沒有通譯是萬萬不能。日籍律師來台開業，其所服務的對象大半是台人，因此也非用通譯不可。以下分敘之。

（一）律師的通譯：人與人之間難免有糾紛，於是就要打官司，台灣人過去是用清國法律，日領以後早期雖仍尊重舊慣，但而後非得依日本法律不可。打官司對台人而言並不新鮮，清代來台官員常說「台人好訟」，但由檢察官、法官、律師共構的法庭經驗，對台人而言則十分陌生，因此要打官司早期非得找日人律師不可。但因日人律師來台語言不通，必須有通譯代接案件，與委託當事人會談，才能打官司。由於台人有祭祀公業，產權複雜，為爭取分配祭祀公業而告管理人，或因分家而起訴訟的不少⁷³。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一書中，提到小說主角胡太明的侄子胡志達，他的工作就是在律師處當通譯（原文為翻譯），據說當時的人敬律師如神明，在神明身邊的通譯自然亦被尊敬。⁷⁴

依各種人士鑑、人名錄中所載的律師通譯有以下數人

1. 陳敬忠：台南人，住在馬公廟附近，曾任台南第八保保正與律師通譯。
2. 黃伯口：台南人，住在天公埕街，曾任台南第十一保保正，律師通譯。⁷⁵
3. 宋義勇：1897年生，台南人，住高雄市，任律師通譯。⁷⁶
4. 張秋煌：台北艋舺人，任律師事務所通譯。
5. 張聰明：台北艋舺人，任律師事務所通譯。
6. 陳廷牆：台北大稻埕人，任律師事務所通譯。⁷⁷

當律師的通譯幫助台人解決問題固然好，但藉機圖利與律師沆瀣一氣的通譯也有。

前面提及小說中胡志達就是跟在律師身邊聳恿訴訟圖利的人，他常在鄉間族人面前吹噓法院判決的情形，讓他們十分佩服，於是趁機請來族中幾位大老到家中，聳恿他們分開管理胡家的祭祀公業，主要的理由是一人管理會有弊端，且很吃力。族人不察以為多少可紓解些經濟的困難，都同意了，於是連署請願書，交到志達手中。管理人是胡太明的爺爺，胡爺爺以自己不德並不反對交出管理權，當召開族中大老會議時，胡志達的父親認為公產少，分配所得也不多，反對分產。他萬萬沒有料到，這是自己兒子的主意。

事情還是在志達狡滑的計謀下繼續發展，他宣稱簽了請願書卻不履約要罰款五百元，族中大老被迫仍不得不同意分產，這些不必要的「不幸」事件，漸漸發展到全村。吳濁流最後在小說中沉痛地指出。

以前在和事佬手中就可以圓滿和解的村中糾紛，往往慫恿使其移到法院去處理，當時的保正因此漸漸變得沒有什麼力量。但志達的勢力漸大，遇有訴訟糾紛，這老奸巨滑的律師翻譯和他的主子——律師——的口袋，就隨著膨脹起來。⁷⁸

（二）私人的通譯：有關私人的通譯，可以板橋林家的林熊祥，霧峯林家的林獻堂為例來說明，事實上他們除有固定的通譯外，會日語的朋友、親人也常權充通譯。

1. 林熊祥：林熊祥並非全然不懂日語，因他曾在東京學習院中學及高等科學習，⁷⁹但為了辦事方便，他仍聘請日籍辦事員兼通譯。事緣林熊祥貸給軍閥時期

的福建省政府高達 260 多萬元的借款，⁸⁰但北伐後國民政府並不認賬，於是林熊祥乃向福州日本總領事館要求向國民政府確定此一債務，⁸¹這時就必須由通譯與日本外務省、駐華公使館密切聯繫。林熊祥聘請村本傳藏出面辦事，當事情即將有眉目時，林熊祥冒酷寒到北京，沒想到在未抵北京前村本到戶外滑冰，與人迎面撞上，對方冰鞋刺進腹部，雖經送醫因併發為腹膜炎乃不治死亡，於是另聘友田勇。友田勇不如村本，且常往南洋「出差」，後竟在菲律賓行蹤不明。⁸²這些日本人通譯在林家的待遇自然比一般佣人高，類似客卿；而林家的家產管理則另請有「家長」管理。

2. 林獻堂：林獻堂在割讓當年方 15 歲，應該有機會入國語傳習所或公學校就讀，但林獻堂並未選擇此路，以致後來他不斷找日語家教來教日語，卻因已上了年紀而沒能學好，不過應該有一定的聽力。林莊生（莊垂勝子）收藏有林獻堂於 1940 年 9 月 7 日寄給莊垂勝的日文信，他對林獻堂的日語能力和用通譯一事有如下的說法：

由來一般人都認為林氏不諳日語，因為他與日人交涉均由秘書翻譯。但從此信看來，他不但會讀、會寫，所用文詞也相當高格。以此類推他對日文之聽與說兩方面，應毫無困難。但他一直以台語與日人周旋，可能是他的矜持，不願用第二流、第三流的日語跟日方交談的原故吧！⁸³

林獻堂第一個見諸記載的秘書兼通譯是施家本（1886~1921），字肖峯，鹿港人，他是鹿港舉人施仁思的嫡男。17 歲入鹿港公學校就讀，遂得越級，並考上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年就因故，⁸⁴而被學校開除。不過他的日語已不差，能做和歌。他和林獻堂相識與 1911 年梁啟超來台，施家本應邀參加歡迎會有關。因此 1915 年到 1920 年間，他任「灌老的秘書兼翻譯」，⁸⁵他在擔任通譯期間，曾伴林獻堂赴日、赴中，如 1919 年田健治郎總督要來台履任時，林獻堂在東京送之，又同船，田總督在日記上留下如下紀錄：「林獻堂通譯施家本賦三絕謝恩，詩書共可見也。」⁸⁶回台後他還陪林獻堂去見田總督，提出台灣統治改善之意見書，共八款。⁸⁷翌年又到總督官邸提出創立台灣拓殖銀行創立案，唯總督認為不妥。⁸⁸至於他離開霧峯，其原因葉榮鐘說第一是意見相左，第二是金錢的關係，⁸⁹施懿玲也認為是「與人扞格不入」。⁹⁰合則留，不合則散。

楊松遞補施家本而成為林獻堂的繼任通譯，他曾二次陪林獻堂去見田健治郎總督，第一次，回應田總督的意見將台灣拓殖銀行改為台灣農商銀行。⁹¹第二次則和林瑞騰、林建寅和林獻堂拜訪總督，所談之事為何，不詳。⁹²楊後來入「滿洲國」，任「滿洲國」駐大阪辦事處商務官。⁹³

1922 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展開的第二年春天，林獻堂到日本訪問內閣首相高橋是清，向他說明台灣議會請願之宗旨，⁹⁴在這段過程中，他用了一個新的通譯，那就是曾經任過台中廳、州通譯，畢業於台南師範學校的許嘉種。⁹⁵

另一個較長期擔任林獻堂通譯兼秘書的是溫成龍，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⁹⁶原在帝國製糖會社任職，因受到差別待遇，想在剛成立的大東信託會社工作，⁹⁷林獻堂乃為之介紹，⁹⁸後亦不果。迨林獻堂歐美之遊回國後，才在 1929

年4月21日任他為通譯。⁹⁹他一直擔任到1937年林獻堂赴日，始改為書記，而由其弟溫成章代替通譯之職。¹⁰⁰溫成章，台中第一中學畢業。¹⁰¹

他的侄子林漢忠、外甥楊雲鵬（又稱天佑、添財）也都曾擔任他的秘書兼通譯。實則只要會講日語，都可能成為林獻堂面見日本要人的通譯，如見台灣總督時請蔡培火通譯。¹⁰²

以上為台灣大家族的通譯，當時凡不精通日語的地方士紳大約在進行公事或與日人週旋時都要通譯，只是如板橋、霧峯這種大家族會長期雇用，其餘的則因事請人，短期雇用，如外出旅行當時並未有旅行社，因此必須有通譯兼嚮導，如蔡蓮舫的妾廖氏貴赴上海時就請謝廉清為陪。

3. 服務會社或醫院的通譯：如出身於嘉義農林學校的蔡啟書，他在1932年5月任員林郡興農倡和會通譯兼技手；¹⁰³出身於苗栗造橋的巫開財，1924年畢業於後龍公學校，旋入南日本製糖會社任通譯，前後6年。¹⁰⁴三峽的李錫揚，三角湧公學校畢業，曾任台北製糖株式會社通譯。¹⁰⁵彰化二林人柯大樹，鹿港公學校畢業，而後入書房進修漢學，遂入日本芳釀株式會社台中出張所任通譯。¹⁰⁶1909年畢業於台中公學校的吳再恩，他在1914年任職台灣青果同業組合顧問山口義章法律事務所書記兼通譯，前後5年。¹⁰⁷新竹市的傅順南，1914年公學校畢業後，為了自修，於1917年入台灣拓殖製茶株式會社任通譯，前後4年。¹⁰⁸亦有在醫院任通譯者，如台北人黃淵源，他在醫院任醫生、幹事兼掌書記、通譯，¹⁰⁹高雄人陳廣進，是洋藥種商進安藥房主，曾任醫院通譯。¹¹⁰

除了公家機關培養、任命的通譯，律師等私人、會社任命的通譯外，太平洋戰爭前後，為了因應日本對華南等地的侵略，軍隊中也抽調了台灣通譯，遠赴戰地，此種通譯又和前述的性質不同，所受的挑戰更大。

四、戰爭中的通譯

自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接著是1937年的七七事件，日本將這一連串的對中作戰稱為十五年戰爭；中國方面視七七事件前東北、華北的戰爭是局部戰爭，自1937年後到戰爭結束，稱做八年抗戰。七七事件後日本加緊對中國的侵略，9月展開上海之戰，1938年2月華中作戰，9月為廣州作戰，12月海南島作戰，¹¹¹上述戰區需要閩南語、客語（或廣東話）的通譯，因此台人雖非軍人卻陸續被調到戰場，成為準戰鬥人員。¹¹²如果台人能說北京語，或英語等，則除華南以外，到華北或南洋當通譯亦有可能。本節先談通譯的調用，在軍隊中通譯的表現，以及吳濁流小說中戰地通譯的角色。

（一）、通譯的來源：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於1936年（昭和11年）實行皇民化運動，企圖進一步同化台人，使之為日人賣命，納出血稅，¹¹³但又不放心台人的忠誠度，因此直至1937年前後開始征軍夫。由於早期日軍節節勝利，所給的月薪高（且有安家費），服務的期限為一、二年之間，因此對於某些台灣青年而言是一種好的工作，自動應徵的不少，但強迫徵召者亦有。日人更在出征、回鄉都以隆重的儀式予以激勵，能當軍夫者亦視為一種榮譽，當時甚至有「譽れの軍夫」

來讚美軍夫的英勇。而此曲是鄧雨賢所作「雨夜花」的曲，由栗原白填的詞。¹¹⁴

通譯與事務的助理是台灣人，是不經正式考試可以在官廳或日人會社中所能擔任的工作，¹¹⁵這也是台灣人必須往海外活動的原因之一。而在荻洲立兵任台灣軍參謀長時，強行廢止漢文、寺廟改善、禁說土語、禁穿台灣服裝，¹¹⁶這種急速改變台人習慣的作法，亦帶給台人一股強大的壓力，因而前往海外，也是原因之一。通譯是準戰鬥員，前往海外比一般軍夫更為危險，因此戰地通譯一職對台人未必有吸引力，但被徵召卻又不能不從。

1937年9月，日軍準備進攻廣州，登陸バイヤス灣（白亞士灣）並海南島。由於此為最高機密的作戰，因此需要的通譯自然不可能是公開招募，而是征用沒有任何軍事、體能訓練的醫生、律師、會社的高級人員充當；¹¹⁷海軍用的通譯，則由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指定公學校的訓導從軍，如高雄州五溝水公學校的邱發霜、旗山第一公學校王王雲、新竹州竹東公學校訓導蘇進、台北州蓬萊公學校訓導沈石財、宮前公學校訓導紀水傳、東園公學校訓導吳廖盛霖、板橋公學校訓導楊水生、大龍峒公學校訓導吳阿源、台南州台南公學校訓導郭聆音、汕頭東瀛學校教師何燭舟。¹¹⁸

有些通譯不太能知道其出身，如在上海戰地，以軍夫兼通譯，出身澎湖的郭遠山，¹¹⁹又如戰前在廈門活動，戰爭中任汕頭海軍部隊長早川大佐（小林總督的親弟）的通譯之劉阿呆。¹²⁰

（二）、通譯的工作：不用說，通譯的任務是溝通兩個語言不通的人，而戰時的台灣人通譯是在日軍武力為後盾下，才能順利展開的工作。除了上述任務外，有的還兼斥候，前所提的郭遠山，他和軍隊穿同樣的服裝，每天都到很近敵陣的地方做斥候的工作，直到凌晨三時才能回隊，他也懂北京話；原本他是軍夫，因此可說是身兼數職。¹²¹又如劉阿呆，他在日軍進入汕頭後，和士兵一起入城，宣佈日軍的目的，勸城內的人不要逃走，要他們安心歡迎「皇軍」，因而完成任務。¹²²再如沈石財，他曾在兩軍交戰之際，跳入敵人的戎克船並予生擒，此外也立了不少功，而有了如將校般的待遇，成為軍隊中的重要人物，回台後任台北海軍武官府神浦少佐的部下。¹²³

如上可知，通譯工作的多樣性，有時甚至就是戰鬥人員；占領地的宣撫工作也是重點之一，上述工作都有相當的危險性，因此也有人喪生，如王永福的戰死。¹²⁴通譯工作的危險性，可以由津村大尉所著的《戰記：南海封鎖》一書中所描述的台灣人出身的通譯工作可知。

在某次臨檢戎克船的任務中，一陣鎗聲短兵相接，日軍跳上船將戎克船甲板上的四個人綁起來，並掃射船內，等到船沒有抵抗時，通譯邱君受命用麥克風向船喊話，日本軍逮捕了一些人，將之綁在甲板上後，由邱通譯協助訊問和搜身，由於查不出真相，乃要邱通譯去問話，並要他恐嚇船員，若不說清楚要處死。¹²⁵書中的邱通譯必須翻譯日本執法人員恐喝的話語，站在同是漢人的立場，對被處分的人難免有某些感觸吧！¹²⁶

（三）、通譯胡太明的遭遇

吳濁流名著之一的《亞細亞的孤兒》(又名《歪められた島》)中主角是胡太明，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教了書後又到日本留學，回台後找不到工作，暫時到朋友開設的農場，卻因朋友經營失敗又告失業。而後到南京執教模範女子學校，再因台灣人的身份被誤認為間諜，遂被逮捕，幸賴過去學生的協助而逃回台灣。七七事件爆發後，他被命參加海軍作戰，在歡送會過後入伍，不久到廣東，他因同情一個魁梧而全身被鐵線捆綁的男子，給予水而被阻止乃又塞仁丹給那名即將喪命的男子。之後胡太明的部隊逮捕 8 個「抗日暗殺」的嫌疑犯，審問時胡太明擔任翻譯，在 8 個人都被宣佈判死刑時，他「黯淡的心靈不禁碎成片片」！「太明每次擔任審問的翻譯工作，漸漸地對此感到相當痛苦。」¹²⁷有一次一個救國義勇隊長年僅十八、九歲的英俊少年也被判死刑，當時日軍用砍首的方式，太明因任通譯官不得不在現場觀看。隨著劊子手一一執行，胡太明全身惡寒地顫抖著，他努力支撐著他的身子，終於輪到了隊長。

忽然隊長用尖銳的聲音要胡太明翻譯他的話，他寧可要槍決不要被刀砍，墓穴要與他人分開，……都被否決了，最後隊長要求抽一根煙。隊長神色自若地抽煙，最後說：「不要眼罩，我是軍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十八年以後又是一條好滾〔漢〕」，他話還沒說完，只聽一聲吆喝，頭已落地。胡太明深受刺激，只覺眼前一片昏黑，寒風直撲臉來，頓時昏過去，只聽到有人在背後罵了句不中用的東西。在發高燒、囁語持續一個星期左右後，遂被送到醫院，不容易復原的他遂被送回台灣，結束他的通譯生涯。¹²⁸

早期當軍中通譯的因有時限，在戰爭結束前大半能回到台灣，但戰末或戰後的通譯則遭遇到空前的難關。舉例來說日本投降後，生長於爪哇的台灣人楊繼興，曾擔任日本憲兵通譯約一星期，1946 年 5 月，楊被荷蘭軍人指控其為日本憲兵或通譯，隨即被荷人政府所捕，一直到 1947 年 7 月仍被關在監獄。而後在國府駐巴達維亞總領事館協助下，荷方檢察機構才答應在 1947 年 12 月結束審訊，¹²⁹唯不知是否被判刑。在南洋的台人俘虜監視員或通譯為荷方逮捕後，在俘虜收容所受到非人道的虐待，以報復其為「日」作僇。¹³⁰

另高雄人鍾逸民(鍾材上)，畢業於日本京都藥學專門學校，1934 年畢業後到北京任西城醫院藥劑師約一年，1944 年轉任青島新生製藥化學工廠技師半年，並任憲兵隊通譯半年，戰後疑有犯罪行為被檢舉，經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偵查，以不起訴結案。¹³¹

比起早期的通譯，戰時的通譯往往在戰場的第一線進行喊話，或招降、或宣撫，當審判時的翻譯，有時還當斥堠，參加戰爭，成為一名準戰鬥員，通常所穿的衣服和軍隊不同，但海軍通譯的服裝則完全相同，¹³²雖然其生活相當辛苦，¹³³但工作成果常獲得日本上司的肯定，如著有《廣東進軍抄》¹³⁴的軍官火野葦平就說，台灣人在須要遵命的戰場中顯示出非常順從的性格，且都很認真的工作，和朝鮮人的性格不同；¹³⁵古莊中將，即攻打廣東バイヤス灣的將領，他也稱譽台灣通譯在困苦缺乏物資之際能嚴守軍規，與日軍一起勇敢地行動。¹³⁶

不過並不是每一個通譯都能勝任愉快，因為未受過言語及戰地訓練的人無法

適應戰地的生活與任務，有的人在語言上並不十分暢達，故通譯的能力不高，只好不當通譯而回到原來的工作，如學醫的當軍中醫生，會碾米的技術人員就送到適才適用的職場。¹³⁷由此也可見戰時通譯並未訓練，且係強征性質。名中醫莊淑旂女士之父藥種商莊阿炎，因懂客家語就被徵調為通譯，當時已 59 歲，他在接受歡送後到軍隊報到，腸子一直發炎，便出腸液，身體檢查不及格被趕回，悄悄由後門進入，怕被人看到沒面子，是為強征之一例。¹³⁸

由上述例子可知，到終戰前被調的通譯屬強迫性多，在日人淫威下被採訪時常講出自己當通譯有多光榮，要為皇軍賣命等堂皇之語，日人又用歡迎、歡送及「無言的凱旋」等儀式的莊嚴來加強通譯的「榮譽感」與「報國心」，實則台人內心應有矛盾，常在掙扎中，人格不斷被扭屈，正如實顯示了在中、日兩國夾縫中生存的台人之難處。

五、成名之通譯舉隅

通譯在職通常短則數個月，多則六、七年，也有的通譯只是兼差性質。就職期間可以經由雇主接觸到大人物，而受雇主等賞識者，可能因此而平步青雲另創事業，有的則因通譯而使語文更加嫻熟，終至能著書立說。日治早期任通譯的台人，多少是受過漢文教育者，他能盱衡時局瞭解多通一種語言則可以「觀國風、察民情而無捍隔難伸之患。」¹³⁹因而入傳習所、公學校就讀，畢業後成為通譯。但也有人不以通譯為職業，如清代秀才台南的謝汝銓，他於 1901 年畢業於培養通譯的學校—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國語科，¹⁴⁰但他並未走入這一行，選擇入台灣日日新報社。

台灣最初考上普通文官和高等文官的三位人物都曾任過通譯、翻譯。嘉義賴雨若，1868 年生，受漢學教育，1895 年台灣割讓，這時有漢文素養的他以 17 歲的年紀進入嘉義國語傳習所就讀，先任嘉義辨務署臨時雇，接著到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任雇並任通譯，受到環境的刺激，他在 1905 年普通文官考試及格而得任法院書記，而後再接再勵就讀日本中央大學，於 1923 年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得任律師。¹⁴¹他被稱為最早文官普通考試及格者，同時也是台灣第二位律師。¹⁴²與賴雨若同時考上普通文官的鄭蘭汀，畢業於新竹國語傳習所，遂入新竹法院任通譯，而後考試及格，可惜早逝。¹⁴³台灣第一位高等文官考試及格者為劉明朝，¹⁴⁴他在 1923 年高等考試行政科及格後，先任職總督府土木局庶務課，1924 年 5 月乃任專賣局翻譯官，前後八個月。¹⁴⁵他最後當到高雄稅關長轉總督府勅任事務官，而後辭職。¹⁴⁶

另一位有名的翻譯官是蔡伯毅，台中清水人，他得到警務局長（？）湯地幸平之知遇，成為台灣人中最初任警部者，也是最初的翻譯官，¹⁴⁷而後放棄日本籍成為中華民國籍，遂渡杭州賣卜，生意相當好。¹⁴⁸

以下介紹幾個相當有成就的翻譯官、通譯：

（一）、片岡巖：日本福島縣人，他曾任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多年，¹⁴⁹在公餘之暇，涉獵群書，或質之耆老，以完成《台灣風俗誌》一書。該書分成十二

集，共一千多頁，書中敘述台灣的風俗。雖然他自己在序言中說其編此書的目的，乃為了使島民悅服以施同化之策，故須詳悉民眾的心理，而要了解其心理，必先了解其舊慣並善用之。十二集中，每集又分數章，最後還有附錄，包括台灣的植物、動物、礦物，可說將台灣民俗、食品、行業、階級、花柳業等資料鉅細靡遺地收集，¹⁵⁰這一部內容豐富的民俗資料，即使到今天，還沒有任何一個人的著作翔實、完整超過它。

（二）東方孝義：日本石川縣人，與片岡巖一樣，以通譯的身份在台南地方法院嘉義支部檢察局服務，¹⁵¹而後調任高等法院檢察局任通譯。¹⁵²他也出版《台灣習俗》一書，其主要目的在了解台灣風俗變遷的軌跡，以資移風易俗。出版在戰時中的1942年，正如《民俗台灣》一樣，他所揭櫫的出版理由是，國家要邁進首需人和，人一和即可互相理解，而理解是相識之始，若知其習慣、風俗、人情、思想，則彼此能熟知長處與短處，自然生出融和和協調，即能相互理解。如或不戴此一帽子，此書恐怕難以出版，書中有些空白的地方，顯見是遭刪除之結果。

153

本書共422頁，分為服裝、食物、住居、社交、文學、演劇、音樂、運動、趣味，內容類似《台灣風俗志》，但有些特出之處，一、因本書出版在1942年，而《台灣風俗志》出版於1920年，因此多記了22年他所觀察到的台灣現況；二、書中某些採集是片岡巖書中所無，如當時流行的歌：如歐戰歌、反動團體攻擊歌、肉彈三勇士歌，官廳團體所出的宣傳歌及最近的流行歌，¹⁵⁴亦即東方孝義還採集他當時所見的「習俗」、「現況」；又如文學類，書中有〈現在台灣人の文學運動〉、演劇類則有〈台灣演劇現在の狀態〉等，¹⁵⁵令人讀來既新鮮又趣味盎然。

（三）、謝介石：新竹人，幼時曾在明志書院接受三年傳統教育，打下漢文根柢。日本領台時他已十七歲，先入日人在新竹設的竹城學館，學習日語六個多月，竹城學館先是改名速成課，後正名為「國」語傳習所，1896年畢業於新竹國語傳習所。¹⁵⁶時櫻井勉任新竹縣知事，重用謝介石為其通譯。¹⁵⁷之後，謝再入新竹公學校就讀，畢業後受里見義正廳長¹⁵⁸的信任，仍任通譯，1904年受里見廳長推荐，到東京東洋協會專門學校（日本拓殖大學前身）任台灣語講師，¹⁵⁹專門教導準備來台就職的日本官員學習台灣土語。

有漢文底子，且已17歲的他，在日人設國語講習班即首應召募，並在短時間內學會日文，一者可知其沒有強烈的華夷之辨並知學習另一者語言的好處；二者可知其能力強且志在四方，勇於做新的挑戰。既有機會赴日，乃抓住機會，一面教書，一面就讀明治法律學校（即日後的明治大學），畢業後乃赴中國大陸發展。1914年8月5日他放棄日本籍，而於1915年12月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¹⁶⁰往後，他利用語言的優勢活躍於外交界，1927年12月他被遜清皇帝溥儀任命為外務部右丞天津行在御前顧問；¹⁶¹九一八事變後，被吉林省長熙洽任命為吉林交涉署署長，¹⁶²為熙洽在即將成立的「滿洲國」中謀取組閣之權，但未成功。¹⁶³「滿洲國」成立後，他被任命為滿洲國第一任外交部總長，¹⁶⁴1932年9月18日他任特使到日本，向天皇致謝承認「滿洲國」，¹⁶⁵並於帝政後（1934年3月1日）改

稱外交部大臣，且隨溥儀赴日「謝恩」，¹⁶⁶同年5月21日卸任，改為參議，二天後被任命為第一任駐日大使（原「滿洲國」駐日全權公使為丁士源），一直到1937年5月卸任。¹⁶⁷前後五年擔任外交工作。不過「滿洲國」既是傀儡政權，謝也就不可能有所做為，外交部大事，都是由次長、日人大橋忠一處理。謝介石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被以漢奸之名逮捕，瘐死獄中。¹⁶⁸

謝介石以通譯為始，以漢奸為終，可謂過了傳奇的一生。

（四）許文葵（許媽葵）：被寫入小說的通譯許媽葵，鹿港人，1900年生，台中中學第一回畢業生，歷任台中州書記、通譯，而後任故鄉福興庄長。¹⁶⁹他在任台中州通譯時，正好日本名作家佐藤春夫來台訪問（1920）三個月，¹⁷⁰他奉命當導遊兼通譯。作家回日本後對這次的旅行多少著墨，陸續發表13篇小說，其中〈殖民地之旅〉（1932、9~10）即敘述通譯許文葵伴隨佐藤在台中當地訪問的情形，書中稱許文葵為「A君」。佐藤準備去看的地方，大半是森丑之助所推荐，而由日本官方給予特別的安排和保護。

A君帶著佐藤到鹿港要訪洪棄生，被洪棄生賞以閉門羹，¹⁷¹而後訪問書法家鄭貽林，其次到豐原三角仔呂宅訪問，¹⁷²第三到霧峯訪林獻堂。佐藤對台灣的知識人抱以同情，而將A君對日本統治的不滿寫下來，如當兩人到鹿港，A君即說：「鹿港是在今天唯一尚能完全避免內地人的蹂躪、保存真正的台灣——不，中國，比現代的中國本土更具有濃厚的支那氣氛的市街。」¹⁷³當他們到葫蘆墩，A君立刻批評日本人以日本風味的名字來替代殖民地的名稱，何況原來的地名沒有什麼不好，如果改成「瓠村」還可妥協，但改成豐原則沒有必要。A君的議論是「對土民而言，到目前為止一直稱呼慣了的地名，心不甘情不願地強被改稱，而且是被改為意義完全搞不清楚的外國語的名稱，那絕不會是愉快之事，……這樣徒然激起土民被征服的感情。當然，在征服者而言，這樣做或許正好感覺相反，伴著一分愉快的感情也說不定。……」¹⁷⁴而在旅途中他也大大發揮了日本將反抗日本的台灣人當成匪徒、賊徒的不當。他說這些人在台灣人眼中則是愛國者，當鎮定匪亂的碑立在並非只有日本人看得到的地方，「實在是為政者的沒常識」。¹⁷⁵

A君這些反日的言論，聽在佐藤的耳中十分礙耳，對於A君的議論，佐藤有如下評論：

或如A君這樣安身甘為一個受內地人頤使的小吏以求榮達，或如一般人以喜好結交內地人為名譽之類的風習，見之令我覺得卑屈，怎麼也無法苟同的地方實在不少。¹⁷⁶

之後他在訪問林獻堂，聽林獻堂對台人文明的自負，及向他請教有關同化論和平等論的問題，卻令佐藤無解。在通譯過程中，「A君時而舉拳時而加入全身的动作，大展其雄辯之才。」¹⁷⁷林獻堂接著批評日本人在台灣執行的差別待遇政策，主張要「友愛」，並要A君原原本本地通譯，不要僅做做大略。A君回答說他一直都在詳細地通譯，其實林獻堂是不要通譯的，只是不願說日語而已，完全聽得懂。¹⁷⁸這也映証了我前面所做的敘述，林日文的聽力、閱讀力應該不錯，只是說、寫不流暢而已！

林獻堂與佐藤談話主要表達了兩個論點，一是台灣人仍以自己的文化自負；二是苦惱於日本對台人的差別政策，而兩人交談時，官方也派有人員在旁一一紀錄，連佐藤也不免有如下的感歎：

目送著他起身往室外去的背影，我深深地感到，被總督府作為賓客待遇的我，在和這個土地的名望之家會面時，還須要麻煩這種官員來監視。這種嚴重地警戒的舉動，正是對林氏所說的言外之意的證明啊！¹⁷⁹

（五）菊機關的通譯洪口明：台北人，1915年生於福州，因為父親洪禮修任職於福建省福州農林學校，故全家遷福州，就讀東瀛學校，再回台就讀台北州立工業學校（今台北科技大學）。畢業後到「滿洲國」國務院任職，因不耐酷寒，1936年再回台；而後入台灣鐵道部服務1年5個月，再到東北，¹⁸⁰之後即被日本的特務機關菊機關吸收，任通譯職。由於他粗通英語、北京話、閩南語，熟諳日語、福州話，因此被看上。據《閩台漢奸罪行紀實》，有關其罪行有如下的描述：

洪奸口明，年三十二歲，台灣人，畢業於台北州立台北工業學校機械科，乃為敵方重要間諜之一，於二十九年由日本政府情報局南支調查會台北支部、以通譯名義派其赴汕頭特務組織「菊機關」工作，實則幫助其主官木村得一收編偽軍，圖謀擾亂我後方之治安。時敵菊機關掌握下之偽和平建國第一集團軍司令黃大偉，受命第二次進犯閩南東山，該奸被派為該偽軍聯絡官，指揮軍事攻略，並監視黃奸之活動。三十年四月間，敵南支派遣隊攻陷福州，該奸又隨敵酋廣東特務機關長矢崎堪十少將到福州，組織特務機關，策動成立偽福州治安維持會，控制各經濟機構，以施展其間諜陰謀而遂行「以華制華」之毒計。卅年九月，敵軍自福州潰退，該奸逃返廣東敵特務機關報到，旋奉派敵廣東聯絡部汕頭支部工作。卅年四月間，該奸復奉敵南支派遣軍司令部之命，來廈敵「廈門機關」工作，該奸雖矢口否認為該機關副機關長，然其供錄中有「因我常替敵情報員通譯之緣故」一語，其職務之重要委婉可見。當卅三年二月間，該奸又曾隨敵廈門機關長歲森董信到南竿塘佈置福州、長樂、連江一帶之間諜網，並與偽軍張逸舟訂電訊連絡辦法；同時籌組海通船行為敵情報機關之掩護，擁有情報船五艘，利用船員刺探內地消息供敵軍作戰參考資料。三十二年春，該奸兼任偽福建日華同志會秘書，負責監視自福州退廈之群奸群動態，組織外圍、搜集情報並派遣間諜入建甌，測繪我飛機場地圖，刺探軍事機關名稱、番號，案經肅奸會檢舉獲案訊辦，供認前情不諱。又據供於卅四年三月間，為我中美合作指揮所駐廈工作人員紀天恩所策反間，曾數次供給金廈敵軍動態之情報等語。然肅奸會無案可稽，況該奸又為敵間要角，是否套取或施展其間諜鬥爭之詭計，則難憑信，自不能因與我方工作人員有端而遽予減刑。唯自稱廈高一分院接辦後、迄無下文！¹⁸¹

戰後洪在鼓浪嶼被林頂立派來的人逮捕，翌日送到「軍部」（其實是醫院的太平間）手腳被銬，而後送到廈門海軍司令部，接著轉到警察局用刑，再轉送肅奸

會，再送到廈門大學附近南普陀看守所。判刑確定後送到鳳嶼監禁，後經以五萬元交保，前後在獄中一年。回台後開油漆行。¹⁸²

六、結論

通譯是日治時期新興的職業，他是一種工具性的存在，也是台人較容易得到的職業，有人把握住機會，因語言能力被肯定而得到上司（雇用者）的青睞，以此為晉身之階，往後平步青雲；也有人僅將通譯當副業，只短期任職或者是兼職，多則數年少則幾個月就轉行。通譯通常是書記或秘書的兼職之一，有時也稱翻譯官，不過《台灣總督府職員錄》所載的翻譯官卻不一定是日、土語的通譯而是懂北京話或英、法、德等歐洲語。本文所及的通譯指的是台、日語通譯。

日治時期在台灣島通行數種語言，多種多樣的原住民語統稱為「蕃語」，還有福建語（閩南語）、客語，以及統治者的日語。由於第一批來台的軍隊是經黃海之戰的近衛師團，軍中的通譯以北京話為主，來台之後發現台地通北京話的人不多，乃開始訓練台人學日語，如民間私設日語傳習所，如隨日軍來台的佛教團體宗派如真宗本願寺、曹洞宗、真宗大谷派等僧侶先後在台北、彰化、台南等地設國語學校，結業後可擔任基層吏員或通譯，因此入學者不少。而日本政府也在各地設國語傳習所，進而設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有語學部國語科來訓練通譯。

至於日人學台語，除有民間自設的台灣土語研究會，發行《台灣土語叢誌》等書以為推廣外，日本政府也在總督府內設「台灣語講習所」，要雇員以上的人員學習台灣語，¹⁸³而國語學校中日人學生也每週有 10-12 小時的土語課程，在數管齊下後，通譯人員越多，就不再需要大量人員，何況只要有公學校畢業的學歷即可隨時客串通譯，因此在總督府和地方也就慢慢有了定制，而通譯中也有人當判任官。

在官廳中最多見通譯之處是最高法院、覆審法院，或各地檢察局，而且這些通譯無論日、台人都是相當優秀的人才，往往任職一久，還能著書立說；其次早期各地方辨務署、支廳，需求的通譯不少，日台人均有，這些人中畢業自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的人不少，但漸漸的就不再需要，因此不再有固定的通譯，而以他職者兼任為多。警察機關也需通譯，但因下級警吏皆須練習土語，或如巡查補本身即由台人擔任，因此警察機關反而不設正式的通譯而由警察本身兼任，因此特別設有所謂「土語手當」（津貼），以示鼓勵。

在私家需要通譯的則是守護人民權益第一線的律師，早期尚未有台人律師，或者在重日輕台的選擇下，選擇日本律師，為了溝通雙方就必須有通譯來協助調查、問話，這時的通譯固然是雙方溝通不可或缺的橋樑，但也有律師因覬覦多額的酬勞費而由通譯挑唆台人析產或分割祭祀公業，使得台民間原有保正協調、和解的機能逐漸喪失。各種會社，如製糖會社、拓殖會社也需要通譯；至於私人也有長期或一時雇用的通譯，以板橋、霧峰兩家的人物來說，大半都有配備私人通譯，如林熊祥借款給福建省政府要不回來時就需秘書兼通譯為他與北京日本公使及福州總領事交接；林獻堂見諸記載有案的正式、長期的通譯還不少，如施家本、

楊松、許嘉種、溫成龍、林漢忠、楊雲鵬；一時的通譯則家人、親友都可擔任，如他赴歐美旅遊時，通譯就是他的長子攀龍與次子猶龍。¹⁸⁴

軍方使用通譯，做為溝通軍民的橋樑，因此也有人入軍中任通譯，但這類通譯之數量不會比 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所需的通譯多。通譯一般來說是軍屬的一類，他不是正規兵，卻必須在第一線做通譯，問口供、宣撫，乃至於任斥候或臨刑時為犯人表達最後的心願，這時期的通譯必須到台灣島外，時有喪命的危險，因此後期在軍中的台人通譯其性質與承平之時的客觀環境完全不同。那麼誰來擔任通譯的工作？由於日本治台已四十多年，只要受過教育的都能說日語，在總督看來那就具有通譯的能力，因此被征調的人員中，醫師、會社高級人員、教師都有。這些人向來經歷戰陣，更未受過訓練，其辛苦可見。有些很快地適應，且能出色地完成任務，有的則不能適用，只好留在戰地仍做老本行。也有一些通譯是志願的。

戰地通譯面臨的挑戰不只是戰地的困苦，還要面對「認同」的困擾，當通譯站在第一線看到日人殺同是漢人的「敵人」，往往心中百感交集，既無力去挽救，也很難裝成若無其事，在這種天人交戰之際，往往見到人頭落地時自己已暈坍下去，如果橫著心為虎作倀，則戰後將面臨漢奸或戰犯的審判，台灣人可說是夾在日本人和中國人間而左右為難，而蔣渭水所謂橋樑論¹⁸⁵也澈底行不通，當台灣人的祖國中國和他國籍上的日本國戰爭時，有在外地的台人，面對的問題是事齊乎？事楚乎？不管選擇事齊、事楚，都得罪另一方。

在通譯中也有些特別知名和有具體貢獻的，或還在人間能獻身說法者。如任通譯的謝介石，因受長官賞識而得赴日一面教土語一面完成大學學業，也以此為始轉變他的人生；被佐藤春夫寫入小說的 A 君許文葵，他藉著通譯的身分將台人對日本統治的不滿傳達出去，帶給佐藤深刻的印象；也有長期任法院的通譯，並經採集而集台灣民俗研究於大成，迄今無人能超越的片岡巖及其鉅著《台灣風俗志》；東方孝義的《台灣習俗》出版於 1942 年，則呈現當時台灣的現況如歌謠、演劇、文學現像。也有任菊機關通譯，走遍中國大江南北，戰後因漢奸罪而坐牢一年多的人……。

藉由如上的探討，可知通譯工作煩重且不一定討好，而 1937 年後的軍中通譯更具有危險性，且在人們的眼中他是一種工具性的存在，但是他做為日、台間的橋樑，化解可能因溝通不良而引起的糾紛；且具有多語的能力，並且兼秘書、導覽、問案的工作，這點具有正面的意義。不過有些通譯不免從事間諜工作，或借機為惡，在社會上其階層不高，因此他雖是一種職業，卻很少人終身做通譯。誠如蔡培火所說，通譯算是台灣人較容易找到的工作，為了生活不得而然。本文寫作過程中上網細將漢珍所做的台灣人物傳檢索一番，大概也只有 220 人在其履歷上寫有「通譯」這個經歷。

- ¹ 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東京：株式會社田 書店，1995 年），頁 36。
- ² 湯誠義文，《台灣土語叢誌》，第八號，明治 34 年 8 月 10 日，台北博文堂發行，頁 76，〈笑林〉。
- ³ 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台灣的商業與原住民〉，收入黃富三等，《台灣商業傳統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 88 年），頁 67。
- ⁴ 尹章義，〈台灣北部拓墾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與功能〉，收入氏所著《台灣開發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78 年），頁 197、272~273。
- ⁵ 台籍公學校教師的薪水不高，且只是日籍教師的三分之一，而台籍師範生大多來自中、上階層家庭，每月十幾圓的薪水不足以吸引；且公學校訓導的地位低，沒有升遷機會，因此義務年限期滿即離職他就者為數不少。見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 72 年），頁 170~171。
- ⁶ 如孫慧敏 2002 年在台大歷史所博士論文為〈建立一個高尚的職業：近代上海律師學的興起與頓挫〉。
- ⁷ 因洪先生人尚健在，姑隱其名。
- ⁸ 此處的通譯指土語和日語兩種語言間的傳譯，不包括北京話或其他語言。
- ⁹ 如普通用語、軍隊用語、商工用語。見芝原仙雄，《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週年記念祝賀誌》（台北：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週年記念祝賀會，大正 15 年），頁 2。
- ¹⁰ 同前書，頁 3~4。
- ¹¹ 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0 年，頁 22。
- ¹² 《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週年記念祝賀誌》，頁 13、22、150。
- ¹³ 許佩賢，前引文，頁 303~304，〈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單〉。
- ¹⁴ 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週年記念祝賀會，《台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台北：該會，大正 15 年），頁 59~61。
- ¹⁵ 《台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頁 121~122。
- ¹⁶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4 年），頁 313。
- ¹⁷ 《台灣土語叢誌》，第三號，明治 33 年 3 月 29 日，後附の五，無頁數。
- ¹⁸ 同上，後附の二，無頁數。
- ¹⁹ 不再學的理由有，在台所居不過數年，將來學成台語卻不住在台灣，故無此需要；要學英語、俄語或官話有其必要，台語只要會「不到本」「好好」即可；台灣人不是新附之民嗎？應該他們要學日語，日本人沒有學台語的理由；我用通譯就好、可不要學；當然也有人說沒空或難學。見《台灣土語叢誌》，第一號，明治 32 年 12 月 20 日發行，頁 9，鳳山堂主人，〈土語學習上の五難關〉。
- ²⁰ 在泉朝次郎，〈台灣土語試驗問題〉，《台灣土語叢誌》，第貳號，明治 33 年 2 月 10 日，頁 94。
- ²¹ 同上，頁 98。
- ²² 市成秀峯，〈土地調査の通譯試験問題に就て〉，《台灣土語叢誌》，第三號，明治 33 年 3 月 29 日，頁 77。
- ²³ 《台灣大年表》，明治 31 年 4 月 5 日，頁 29，〈總督府判任文官及び巡查、看守にして土語通譯を兼掌する者に特別手當を支給する件發布〉。
- ²⁴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文職官員錄》（台北：該府，明治 37 年），頁 31~32。
- ²⁵ 《台灣總督府文職官員錄》，頁 32。
- ²⁶ 同前書，頁 33。
- ²⁷ 同前書，頁 35。
- ²⁸ 同前書，頁 35~36。
- ²⁹ 同前書，頁 36。
- ³⁰ 同前書，頁 37。
- ³¹ 同前書，頁 38。
- ³² 同前書，頁 38。
- ³³ 同前書，頁 38。
- ³⁴ 同前書，頁 39。

- ³⁵ 同前書，頁 40-41。
- ³⁶ 同前書，頁 41。
- ³⁷ 同前書，頁 42、52、111、113。
- ³⁸ 同前書，頁 116。
- ³⁹ 同前書，頁 126。
- ⁴⁰ 同前書，頁 131。
- ⁴¹ 同前書，頁 135。
- ⁴² 同前書，頁 139。
- ⁴³ 同前書，頁 145、147。
- ⁴⁴ 同前書，頁 163。
- ⁴⁵ 同前書，頁 169。
- ⁴⁶ 同前書，頁 169。
- ⁴⁷ 同前書，頁 174。
- ⁴⁸ 同前書，頁 179~180。
- ⁴⁹ 同前書，頁 185。
- ⁵⁰ 同前書，頁 197。
- ⁵¹ 同前書，頁 210。
- ⁵² 同前書，頁 212。
- ⁵³ 同前書，頁 218。
- ⁵⁴ 同前書，頁 2、8。
- ⁵⁵ 《台灣大年表》，頁 29。
- ⁵⁶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台北：該府，大正 9 年）頁 87，依大正 8 年 8 月訓令第 148 號抄，〈各法院、各檢察局書記並判任通譯定員〉。
- ⁵⁷ 《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 9 年，頁 123。通譯為余德興。
- ⁵⁸ 《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 9 年，頁 123、220、244、253、263、281、307、317、340-341、366、388。
- ⁵⁹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台北：該府，大正 13 年）頁 32~34。
- ⁶⁰ 《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 13 年，頁 70。
- ⁶¹ 同前書，頁 89，〈台灣總督府法院職員定員令〉。
- ⁶² 同前書，頁 131，〈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 ⁶³ 同前書，頁 204，〈台灣總督府監獄官制〉。
- ⁶⁴ 同前書，頁 222，〈州、廳ニ於ケル判任官定員制〉。
- ⁶⁵ 上述人物可由《台灣紳士名鑑》、《台灣人物誌》、《台灣人士鑑》中找到，不一一加註。
- ⁶⁶ 台灣新民報，《台灣人士鑑》（台北：該報，昭和九年），頁 101。
- ⁶⁷ 景福基金會，《國立台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台北：該會，民國 81 年），頁 2。
- ⁶⁸ 上村健堂，《台灣事業界と中心人物》（台北：新高堂書店，大正 8 年），頁 205。
- ⁶⁹ 《台灣人士鑑》，昭和 9 年版，頁 497。
- ⁷⁰ 謝國興，《府城紳士辛文炳和他的志業，1912~1999》（台北：南天書局，2000 年），頁 13~16。
- ⁷¹ 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台北：台灣總督府，大正 5 年），頁 99。
- ⁷² 鷹取田一郎，《台灣列紳傳》，頁 316。
- ⁷³ 陳三井、許雪姬訪談，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81 年），頁 53。如林本源祭祀公業原由林家三房林嵩壽（林維德系）掌管，但因揮霍無度，三房（維源系）乃連名請日本律師控告，取回管理權。
- ⁷⁴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民國 66 年），頁 84。
- ⁷⁵ 《南部台灣紳士錄·台南廳》，頁 51、65。
- ⁷⁶ 台灣新聞社編，《台灣實業名鑑》（台中市：台灣新聞社，昭和 9 年），頁 281。
- ⁷⁷ 宣建人著，《台灣人物誌》（台中市：台灣省政府新聞處，民國 70 年），頁 314。
- ⁷⁸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 84~88。
- ⁷⁹ 台灣新民報，《台灣人士鑑》（台北：該報，昭和 12 年），頁 471。
- ⁸⁰ 外交檔，機關 03-20，宗號 40-(1)，閩粵兩省欠還台灣銀行檔案。借款ノ顛末。藏中研院近史所。E160，J6-8-1，自大正 15 年 11 月 17 日至昭和 10 年 1 月，本部ノ地方政府及個人ニ對スル借款關係雜件，福建省ノ部。前後共借九次，計 260 萬日金，63 萬多台伏（福州當地紙幣）。

- ⁸¹ 同前註，機密公領第 272 號，昭和 3 年 11 月 27 日，在南京領事岡本一策致臨時代理公使堀義貴。
- ⁸²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民國 81 年），頁 210。
- ⁸³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民國 81 年），頁 292。
- ⁸⁴ 葉榮鐘認為他被開除「似乎也是因為女人的問題被開除的」。見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出版社，1995 年），頁 266。
- ⁸⁵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在頁 272 說「他自民國二年起，至民國九年和灌老分手止，前後六年餘，跟在灌老左 右」，頁 270~271。又說「是年台中中學的創立工作告一段落，家本先生似乎就在同年轉入霧峰去當灌老的秘書。」亦即 1913 年起施家本就已間歇式地幫林獻堂工作，到 1913 年才變成正式的秘書兼通譯。
- ⁸⁶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編著，《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2001 年），頁 59，大正 8 年 11 月 9 日。
- ⁸⁷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編著，《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259，大正 9 年 4 月 15 日。
- ⁸⁸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編著，《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108，大正 8 年 12 月 8 日。
- ⁸⁹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在頁 272 言，林獻堂相當節省，施家本大概向林借了些錢未還，不過葉榮鐘認為數目 不大，因他從未聽林獻堂說起。
- ⁹⁰ 施懿玲，《彰化文學圖像》（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民國 85 年），頁 93。
- ⁹¹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編著，《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293，大正 9 年 5 月 6 日。
- ⁹²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編著，《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487，大正 9 年 10 月 15 日。
- ⁹³ M2. 50，3-43，在本邦各國外交官領事官及館員動靜關係雜纂 滿洲國ノ部 外發秘等第 2071 號，兵庫縣知事湯沢三千里＜駐滿洲國大使來往ニ關スル件＞；外秘第 1535 號，昭和 10 年 9 月 9 日，大阪府知事安井英二＜滿洲國駐日大使館商務官大阪辦公處員ノ退阪ニ關スル件＞。
- ⁹⁴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頁 96，＜林獻堂先生年譜＞。
- ⁹⁵ 台灣新民報社，《台灣人士鑑》（台北：該社，昭和 9 年），頁 36。
- ⁹⁶ 《台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頁 93，大正 8 年 3 月畢業，為師範部乙科，他曾在彰化第一公學校任教。
- ⁹⁷ 林獻堂撰、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台北：中研院台史所、近史所，民國 89 年），頁 36，昭和 2 年 1 月 15 日。
- ⁹⁸ 《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40，昭和 2 年 1 月 17 日。
- ⁹⁹ 林獻堂撰、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台北：中研院台史所、近史所，民國 90 年），頁 120，「採用溫成龍為通譯」。
- ¹⁰⁰ 林獻堂於 1937 年 5 月 17 日赴日，見是日《灌園先生日記》，未刊稿。
- ¹⁰¹ ＜灌園先生日記＞，1937 年 3 月 29 日。翌日林獻堂日記載溫成章性質沉著寡言而人格修養勝其兄十倍，遂內定採用為隨行，同往東京。
- ¹⁰²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編著，＜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大正 10 年 1 月 17 日，未刊稿。
- ¹⁰³ 興南新聞報社，《台灣人士鑑》（台北：該社，昭和 18 年），頁 287。
- ¹⁰⁴ 台灣新民報社，《台灣人士鑑》（台北：該社，昭和 12 年），頁 522。
- ¹⁰⁵ 《台灣人物誌》，頁 178。
- ¹⁰⁶ 《台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頁 50。
- ¹⁰⁷ 《台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頁 102。
- ¹⁰⁸ 《台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頁 328。
- ¹⁰⁹ 《台灣人士鑑》，昭和 12 年版，頁 520。
- ¹¹⁰ 《南台灣の寶庫と人物》，頁 151。
- ¹¹¹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從蘆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頁 345~349，388~389，397，424，534~540，578~580，636~637，694；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華中華南作戰及其對華戰略之轉變》，頁 174~184，192、209。
- ¹¹² 竹內清，《事變と台灣人》（東京：日滿新興文化協會，昭和 15 年），頁 153。
- ¹¹³ 所謂血稅指的是當兵的義務，由於台灣一直由日軍（台灣守備司令管轄）防守，故日人認為台灣人在政治上受到差別待遇（即指沒有參政權）是應該的。見蔡培火，《日本本國民に與ふ：

殖民地問題解決の基調》（東京：台灣問題研究會，昭和3年），頁117。日本人總是向台人說：「お前達は母國人同様の參政權を要求するならば、母國人のやうに血税を納めよ、兵隊になれ」。

¹¹⁴ 名越二荒之助編著，《大東亞戰爭とヤジヤの歌聲》（東京：展轉社，平成6年，第2刷），頁58，〈四つの歌持つ『雨夜花』〉。

¹¹⁵ 蔡培火，《日本本國民に與ふ：殖民地問題解決の基調》，頁66。

¹¹⁶ 竹內清，《事變と台灣人》，頁176。

¹¹⁷ 同前書，頁131。

¹¹⁸ 同前書，頁135~137。

¹¹⁹ 同前書，頁52。

¹²⁰ 同前書，頁138。

¹²¹ 同前書，頁52。

¹²² 同前書，頁139。

¹²³ 同前書，頁139、143-144。

¹²⁴ 同前書，頁136。

¹²⁵ 津村敏行，《戰記：南海封鎖》（東京：海洋文化社，昭和16年），頁5~8。

¹²⁶ 津村敏行，《戰記：南海封鎖》，頁76；日軍在南海上搜捕中國戎克船，遇到一艘載33隻豬的戎克船，將船頭放置在小舟上予以放逐，雖然給水與食糧，仍然有自生自滅的危險；其他戎克船中的五個人，留置在船上，而所乘的戎克船則沒收，而由艦曳行。日本軍中有人想吃豚井（とんかつ），由籠中放出一隻豬想要宰殺，不料在未動手前，豚因被追趕而衝入海中，豚井自然就泡湯了。

¹²⁷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06。

¹²⁸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208~210。

¹²⁹ 外交部駐台灣特派員公署，〈扶郵代電〉，特字第144號，民國37年7月12日發；駐巴達維亞總領事蔣家棟，〈呈後關於台僑楊繼興被捕案之鑒督轉知由〉，部字第130號，民國36年9月5日發，外交部於民國36年10月18日收到，〈案名：遣送新加坡台僑回台〉。

¹³⁰ 福永美知子，《心果つるまで：日本の戰犯にさせられた四人の台灣のお友だち》（東京：水晶工房，1995年版）頁133~135。

¹³¹ 案卷號998，〈鍾逸民（台灣高雄）戰犯案〉，藏中國南京第二檔案館。

¹³² 竹內清，《事變と台灣人》，頁136。

¹³³ 如前所述的沈石財，他說長久以來，在任務中，飲料水，蔬菜都缺乏，每天以吃罐頭為生。

竹內清，《事變と台灣人》，頁144。

¹³⁴ 火野葦平，《廣東進軍抄》（東京：新潮社，昭和14年，120版）。

¹³⁵ 竹內清，《事變と台灣人》，頁132-133。

¹³⁶ 竹內清，《事變と台灣人》，頁131。

¹³⁷ 竹內清，《事變と台灣人》，頁135。

¹³⁸ 莊淑旂口述、許雪姬執筆，《莊淑旂回憶錄》（台北：遠流出版社，2001年），頁58~59，並有照片為証。

¹³⁹ 王石鵬，〈送謝介石東上序〉，《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明治37年10月11日，1935號。

¹⁴⁰ 《台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頁121。

¹⁴¹ 《台灣人士鑑》，昭和12年，頁393。

¹⁴² 劉克明，《台灣今古談》（台北：新高堂書店，昭和5年），頁130、137。

¹⁴³ 劉克明，《台灣今古談》，頁130。

¹⁴⁴ 秦郁彥，《戰前期日本官僚体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財團法人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頁518，行政科，大正12年。

¹⁴⁵ 《台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424。

¹⁴⁶ 《台灣人士鑑》，昭和18年版，頁445。

¹⁴⁷ 劉克明，《台灣今古談》，頁139。

¹⁴⁸ 林進發，《台灣人物評》（台北：赤陽社，昭和4年），頁10~11。本書稱蔡伯毅為「元台灣總督府の翻譯官」。

¹⁴⁹ 《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9年，頁96。

¹⁵⁰ 片岡巖，《台灣風俗誌》（台北：穎川首發行兼印刷人，大正13年）。共1184頁。

- ¹⁵¹ 《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 9 年，頁 96。
- ¹⁵² 見東方孝義，《台灣習俗》，版權頁。
- ¹⁵³ 東方孝義，《台灣習俗》（台北：同人研究會，昭和 19 年），頁 172，將歐戰歌刪去約 1 行，反動團體攻擊歌只留下一行應景。
- ¹⁵⁴ 東方孝義，《台灣習俗》，頁 176~180。
- ¹⁵⁵ 東方孝義，《台灣習俗》，頁 242~247；327~328。
- ¹⁵⁶ 許佩賢，〈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頁 303，〈附錄一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名單〉。
- ¹⁵⁷ L. 3. 3. 0, 12-1 各國特派使節本邦～派遣關係雜件，滿洲國ノ部，（1）滿洲國答禮使節謝介石，昭和 7 年 9 月。文書課發送，外務省人事課長昭和 7 年 10 月 12 日起草，發信人內田外務大臣，收信人木宮內大臣ノ件名：滿洲國特使謝介石氏略歷送付ノ件。
- ¹⁵⁸ 1902 年新竹辨務署改為廳，仍由里見任廳長。統計里見自明治 33 年到 34 年任辨務署長，35 年至 41 年任新竹廳廳長。
- ¹⁵⁹ 同註 157。
- ¹⁶⁰ M2, 5, 0, 4-50 本邦各國外交官領事官及館員異動關係雜件，滿洲國ノ部，昭和 10 年 5 月 3 日天津發，外務省 5 月 3 日著，駐天津總領事川越向廣田外務大臣報告，第一三四號（至急、極密）；昭和 10 年 5 月 31 日新京發，5 月 31 日外務省著，第 519 號（至急、極密）。
- ¹⁶¹ 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四冊，頁 187，1928 年 6 月 15 日。
- ¹⁶² 《盛京時報》，第 7835 號，民國 20 年 11 月 6 日，第 5 版。
- ¹⁶³ 《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363，1932 年 2 月 4 日。
- ¹⁶⁴ 《鄭孝胥日記》，第 5 冊，頁 2370，1932 年 3 月 8 日。
- ¹⁶⁵ L, 3, 3, 0, 各國特派使節本邦～派遣關係雜件，滿洲國ノ部，12-1（1）滿洲國答禮使節謝介石，昭和 7 年田中總領事代理致內田外務大臣。
- ¹⁶⁶ L, 1, 3, 0, 2-6-1, 外國元首並皇族本邦訪問關係雜件，滿洲國ノ部，溥儀皇帝御來朝ノ件，昭和 10 年 2 月 12 日，南大使致廣田外務大臣，第 127 號（極密）古參事官給重光次官。
- ¹⁶⁷ 《盛京時報》，第 9094 號，康德 2 年 6 月 20 日，第 3 版。
- ¹⁶⁸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許長卿先生訪問記錄〉，收入《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 年），頁 599~600。
- ¹⁶⁹ 《台灣人士鑑》，昭和 9 年，頁 40~41。
- ¹⁷⁰ 1920 年 7 月 6 日到基隆，7 月 20 日到高雄之後前往廈門旅行，一直到 8 月 6 日才回到高雄。訪問鹿港是 9 月 29 日，豐原是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訪阿罩霧。見邱若山所製〈佐藤春夫台灣島內旅行日程推定表〉。
- ¹⁷¹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佐藤春夫一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頁 286、287~288。書中的「詩人」指的是洪棄生。他自認是清朝的遺臣，當佐藤要訪他，透過其子洪炎秋去試探時，洪棄生說「日本人，彼此話語不通，那很困擾。」當再勸他說佐藤是個文學創作者，得到的回答是：「那麼偉大的人物，那更是不便相見！」
- ¹⁷² 據猜測應指呂汝濤、呂孟津父子，即三角仔呂家，當時能稱畫家的，葫蘆墩一帶應是呂汝濤。
- ¹⁷³ 《佐藤春夫一殖民地之旅》，頁 283。
- ¹⁷⁴ 《佐藤春夫一殖民地之旅》，頁 296。
- ¹⁷⁵ 《佐藤春夫一殖民地之旅》，頁 284。
- ¹⁷⁶ 《佐藤春夫一殖民地之旅》，頁 285。
- ¹⁷⁷ 《佐藤春夫一殖民地之旅》，頁 334。
- ¹⁷⁸ 《佐藤春夫一殖民地之旅》，頁 335~336。
- ¹⁷⁹ 《佐藤春夫一殖民地之旅》，頁 338。
- ¹⁸⁰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鄭鳳凰紀錄，〈洪口明先生訪問記錄〉，收入《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 年），頁 309~326。
- ¹⁸¹ 第三戰區金廈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閩台漢奸罪行紀實》（廈門：廈門江聲文化出版社，民國 36 年），頁 17~18。本書標點僅用頓號，故改用逗號或句號。
- ¹⁸²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洪口明先生訪問記錄〉，民國 89 年 4 月 28 日、5 月 18 日、6 月 8 日於台北市農安街洪宅。未刊稿。
- ¹⁸³ 緒方武藏，《始政五十年台灣草創史》（台北：南天書局，1995 年），頁 33。

¹⁸⁴ 林猶龍在戰爭後期還兼任台中州英語通譯。

¹⁸⁵ 日本國中的台人最瞭解中國，漢族中的台人是最了解日本，因此台灣人應當做中國人和台灣人間的橋樑，這是蔣渭水等台灣知識份子的理想，但這一個角色平時或許辦得到，當中日開戰後，台人在台灣，被捲入皇民化運動，在外地亦進退失據，甚至「戰」死沙場，只能做「無語的凱旋」。

（会议论文，原文印发，文中用语和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